

葱
与
蜜

今译深野喜

绿
原

曼顿·艾斯·马少展



今日活丛书

葱与蜜

CONG YU MI

穆 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2×961毫米32开本 6印张 86,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901—3,200

书号10002·62 定价1.10元

题 解

木犀悄然开花的时候，蝉歌和蝶舞终于难乎为继了，而迎春乍一绽放，风斗和火炉（假设你还没有住上装暖气的房子）便开始显得有点儿碍事。这两种花都是黄的，却标志着不同的季节。季节不是由它们决定的，它们却善于随着季节应景儿。在这一点上，植物往往要比动物灵得多，而动物又似乎要灵过万物之灵的人类，而一般人更确乎要灵过写文章的人。文章白纸黑字，如果没有（谅你也没有）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又不能象木犀花或迎春花那样，以相同的颜色为世界传递不相同的信息，并赋有各当其令而枯荣的自发性，那么尽管敝帚千金，也只好让人笑话二四八月乱穿衣了。我一边收拾着旧稿，一边这样自言自语着。

这是我近年来插足诗坛的几篇小文。大都是应约而写的，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方面的破绽。例如，观点的取舍、角度的偏正、口吻的缓急、篇幅的涨缩等等，都难免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尽如意处。就说三

两篇与自己的作品相关的序文吧，一个人(或一群人)失踪了多少年，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才不致显得唐突，这不也需要斟酌一番么？看来，应约写文章，恰象在陌生的听众面前被点名发言一样，声带的颤动多少要比扯家常时异样一些：这种遭遇往往最令人发憊，但生活弄人，偏我又有“憋得慌”的毛病，一旦憋不住，就会忘掉“沉默是金子”的古训。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虽说多少表达了我对诗的一些空疏的看法，放进“今诗话”这套丛书虽，看来是不很得体的。“今诗话”应当是些什么样的文章呢？依照编者的启示和自己的揣摩，理想的“诗话”要短，要随便，要亲切，要避开结论，要知无不言而忌言无尽，当然还要处处与诗相关，这样读起来才有物，有益，而又有趣。其实，中国历代并不乏此类佳作，或记故实，或悬技法，或抒已逝之情怀，或评未定之得失，仿佛漫然而起，戛然而止，实则作为解诗者无不达到目无全牛的化境。有人会奇怪，中国人做诗几千年，为什么没有一本诗话愿意系统化，轨范化，试与西式的诗学较量一番呢？我想，大概是中国人的性格使然；我们并不好为人师，只爱和三朋两友谈天；我们并不欢喜住那些高处不胜寒的思想楼阁，但愿有个足以负暄献曝的四合院。“今诗话”的编者想必期望这套丛书能继承我国古诗话

的这个传统，同时也不妨添置一点现代化设备，否则不便称之为“今”了。把这几篇小文排比一下，自分远没有达到这个期望，它们既称不上平易近人的汉诗话，更不是道貌岸然的洋诗论，不过是一些浅薄的经验和偏执的观点的结合；这个结合体何尝几片萎黄的待落叶，其不及当令的木犀或迎春黄得可爱，是自不待言的。有赖编者的雅量，这本小书才得以付印了，好歹敬请读者斥正。

一位知心的友人曾经轻言细语的告诫我：你是写诗的，岁月抛荒够久了，何必还费时写这类文章呢？这几句象秋风一样，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清醒，使我警惕。是的，我是写过诗的，诗没有写出成绩，倒来向勤奋的诗人们说东道西，评头论足，实不免见笑于大方之家。不过，批评没有好名声，古今中外皆然，我是知道的。十九世纪英国有个拜伦，他说得够刻薄：你准备相信批评家吗，不如在十二月去访玫瑰，六月间去找冰雪，狂风里去追希望，秕糠里去拣谷粒……。这种对于批评的厌憎情绪，虽说不是没有原故的，特别是在拜伦当时的情况下，但我总以为多少有点病态。在任何时代，特别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诗人毕竟离不开读者，因此也必然离不开批评家。贤明而公正的批评家，对于诗人来说，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是殊途同归的战

友，是他的最诚挚而又最严格的读者。他关心诗人——自己的兄弟和战友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甚至不免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也只是为了帮助诗人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作品，认识自己的读者——而诗人作为诗人，至少他在进行创作的升华状态中，是不大认识这些的。因此，理想的批评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既要达理即具有说服力，又要通情即具有感动力；为了说服，他应当在诗人想表现什么、已经表现了什么、这个“什么”是不是值得表现等实质问题上，在素材与生活、形式与内容、作品与读者等关系问题上，不惜同诗人争个面红耳赤；同时为了感动，他又必须力戒独断、僵硬、冷漠和怪僻，必须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诗人创作过程的甘苦，他要象诗人力求和读者之间心心相印一样，努力做到和他的对象即诗人之间心心相印。正是出于对理想批评的尊重和仰慕，我才发觉自己识浅，情枯，力薄，来写这类文章，实在是一种僭越行为。所谓“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尽如意处”，正反映了这种自觉僭越而愧作的心情。

但，更令我愧作的是，这几篇小文连自己对诗的一点体会都没有说得清楚。诗有形象，但诗不是形象；诗有技艺，但诗不是技艺；诗有思想，但诗不是思想；诗有感情，但诗不是感情。诗到底是什么，这个多面的怪

物，在我永远是个谜。中国古诗话讲究“意在笔先”、“意在言外”，这个“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外国的克罗齐谈过这个问题，我们犯不上跟着他把诗神秘化。我只知道，诗虽然是诗人写出来的，但诗人决不能夸大自己的直觉，自命为它的创造者或诞生者。诗在诗人找到它、抓住它、写出它之前，早就活跃在田野上，江湖里，市街中，一直就在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社会生活中自我生长，时时刻刻从你我身边跑过去——它的亲生父母是人民，是我们天天见面、口不言诗、浑身却奔流着诗的血液的人民，而专业的诗人们充其量不过是它的收养者和抚育者。但愿我们所有的诗人们德美如才，当仁不让，共同来完成把中华民族新世纪的新诗这个宁馨儿养育成人的庄严任务。

最后，谈到题解，〈葱与蜜〉是什么意思呢？请参阅本集中〈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一文。这不过是个蹩脚的譬喻，既没有真的葱，也没有真的蜜。

绿 原

1984年中秋节

目 录

题解.....	1
为诗一辩	1
活的诗(试以牛汉的《温泉》求证)	19
记阿垅	32
海外诗人郑愁予	41
《白色花》序.....	50
关于《白色花》及其序	63
《人之诗》自序	71
《〈人之诗〉续编》序	85
答问(关于《西德拾穗录》)	95
周末诗话	101
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139
“夜里猫都是灰的”吗? ——一个读者对于译诗的几点浅见	158

为诗一辩

不，不，我不会反驳你，请尽情讲下去。

于是，你皱着眉头说：“诗的路子越走越窄，几乎日暮途穷，百无聊赖；打个不客气的比方，这几十年不过是一片空白。”说着，你又搓起了双手：“知道吗，而今崛起了新一代，他们在向诗的传统挑战；那片空白将由他们来填补了……”

果然，你讲出了一点事实。但事实象月亮一样：初一咏它是个钩，十五咏它是个圆盘；至于它的背面，除非宇航员，谁也莫名其妙。你既讲了诗的“初一”，让我也来讲讲它的“十五”；至于它的“背面”，留给精神界的宇航员去探讨吧。

你所说的“诗”，当然是指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也就是“五四”以来摆脱传统格律束缚的各种自由诗。大半个世纪以来，新诗跨过了风花雪月，幽径芳草，又历尽了枪林弹雨，惊涛骇浪，虽说秋霜满脸，却已饱经世故，照说应当更能体贴人民的情愫、传达人民的心声

了。想不到老境颓唐，每况愈下，到处看脸色，不是嗤鼻，就是撇嘴，新华书店卖不出去，图书馆借不出去，真有点“奉送一百块大洋也没人要”之慨。然而，新诗的不景气久矣夫，又岂自今日始？“四人帮”时期不说了，“十七年”又如何呢？难道不正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新诗才稍稍缓过气来，微微发出了一点声音吗？难道不正是到了今天，勇敢的“小草”们才恢复一点光合作用的本能，开始低声歌唱起来吗？但是，同其它文学品种相比，新诗的境遇还是够惨的。象西方童话里的灰姑娘一样，——不，象寒碜的蓖麻一样，它凭借自己的生命力，散生在山坡上，田塍上，跟正牌的五谷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不能不令人想起烽火连天的抗战年月。那时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大后方，不论在延安还是在重庆、在桂林，新诗同祖国、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人民需要诗，在寻找诗；诗需要人民，在表现人民。诗是重炮，是轻机枪，是匕首，是手榴弹……和人民一起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庄严行列。

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的诗人艾青。那时，即使在再低沉的政治气压下，只要什么刊物发表了他的新作，他的读者（多么可爱的青年读者啊！）无不奔走相告：今天读到了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一口气念

完了《火把》——我背得出《假如我是一只鸟》——不，还是《向太阳》好……

难道只有艾青一个人？当然不。还有比他年老的，或者比他年轻的；有跟着他学步的，或者同他唱反调的；有写得同他一样好，甚至在某些方面写得更好的……。但是，诗人艾青是那个时代的领唱的歌手，他的一重唱引起了千万重的大合唱。那是怎样一副令人激奋的景象啊！诗人艾青在为他的读者写作，他的读者在期待、在催促、在祝祷他写作。诗人有幸找到了他的读者，读者有幸找到了他们的诗人。

而今天，谁来关心一首诗的发表呢？谁来关心一个诗人的成长、病痛和衰老呢？一首诗再好再坏，在社会的池塘里简直激不起一圈涟漪或一颗泡沫。当然，也有些诗人在勤奋地写作，他们的勤奋也不会不感动一些读者。一些青年读者凭借自己对于诗的朴素的直觉，在新诗园地里摸索、寻找，也不会找不到偶然同自己的情愫相适应的娇花嫩草。然而，整个说来，饱经沧桑的读者对于新诗是失望的，失望之余便是厌弃和冷淡。今天诗人的遭际怎能同当年的艾青相比呢？就是今天的艾青，也未必比得上当年的诗人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艾青同志？）。

诗为什么这样凋零？诗的园地为什么这样萧索？

难道生活里就再没有诗？难道张志新、遇罗克就不是你的姊妹兄弟？难道官僚主义就不需要你“象狼一样去把它吞噬掉”？难道人民的苦难、祖国的新生就引不起你的灵感的火花？诗人啊，为什么只有一株或几株小草在歌唱？

要回答这个问题，真比猜斯芬克斯的哑谜还难。但千万不要去向一贯敌视新诗的反对派求教。他们除了召唤金丝鸟重新回到笼子里去，除了召唤新诗向旧体诗的声韵格律投降，实在没有任何高见。麻雀诚然是丑陋的鸟类，它论声论色比不上画眉、黄鹂，但它却有后者怎么也比不上的一种酷爱自由的天性，它宁死不屈，也决不肯在笼子里载歌载舞，以换取生存的权利。新诗从没有一概否定旧体诗，它将努力继承一千多年中国诗的光辉传统，但新诗在文学史上体现了诗体变革和进化的规律，它将永远在自由而广阔的天空飞翔，决不回头。

然而，新诗今天的确遇见了危机。新诗的危机不在于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不在于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胃口，更不在于缺乏与生俱来的生命力。让我们离开那些反对派，超脱他们的怜悯和轻蔑，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吧。

还是来谈艾青。诗人艾青之为一代诗风的代表，

老实说，除了他个人的才能和成就，还少不了一批爱他、懂他、睁着惊奇的眼睛期待他的文学青年。须知，正是这些读者的敏感的心灵，为诗人艾青准备了精神的土壤，使他的灵感得以象种子一样播撒开来，不断地绽放出新的花朵，反过来把他已有的成就衬托得更加鲜艳。设想没有这样一批读者，让诗人一个人在沙漠里呆着，他能写出什么来呢？他除了披发大叫，以泄郁愤，又怎么写得下去呢？艾青之为艾青，难道不正因为有一批知心的读者？不正因为这批读者道过自己的审美感觉，延长、扩大和普及了他的创作灵感吗？这里用得着一点美学理论了：美感正是美的客观性触发了审美者的主观性而产生的。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是不存在的，艾青的诗对于当年一些纸醉金迷的发国难财的市侩们也是不存在的。然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于音乐的耳朵确是真正的艺术，艾青的诗对于当年那批可爱的青年读者也确是真正的艺术。回头来看今天，唉，诗人们的读者在哪儿呢？他们早已不欢喜诗，纷纷离开了诗人，去寻找荒诞的故事、离奇的情节去了；他们对于情绪、情感、情操都失去了兴趣，任你低吟高歌，莺啼虎啸，都引不起他们的欢喜、愤怒和悲哀。马克思说过，诗人需要亲切的抚爱。^①今天的读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74页。

者对诗冷淡到家了，这叫诗人的日子怎么过？……

青年读者也许会抗议：什么，我们对诗冷淡？！我们需要诗，期待诗，在到处寻找诗啊。可是，什么叫做诗，老师在学校里从没给我们讲过。我们从小都没见过诗，老师自己就讨厌诗，更叫我们怎能欢喜那些分行的散文？

老师会觉得委屈：责任怎能推到我们身上来？君不见大大小小的报刊，特别是富有权威性的大报副刊，成年累月发表一些绢花似的小玩意，似是而非的小警句，从没认真想到有责任为诗的复兴出一臂之力。正是这种无言的提倡和推广，使得一批批假诗、丑诗、坏诗充斥市场，把一代青年的胃口彻底败坏了，叫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保护他们品尝真诗、美诗、好诗的味蕾？

报刊编辑也会耸耸肩，摊开双手：我们不过为人作嫁，量体裁衣，能有多大能耐？难道批评家不比我们更应承担责任？——可不是，哪个批评家认真严肃地研究过诗，更不用说整个诗人了。多少年来，就按“两个标准”办事，而且“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照说，真正运用政治标准的批评，也完全可以写得扎扎实实，有血有肉，于作者读者都有教益，卢那察尔斯基批评马雅可夫斯基和布洛克就是例子。但象这样既严峻又亲切地帮助作者的批评家，我们又哪里碰到过？相反，我

们的“政治标准”的概念狭隘而简单：任何作品都只属于“两家”，不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就属于“无产阶级”那一家，“两家”之间似乎矗立着一堵老死不相往来的高墙。结果，“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批评变得不是残酷的审判就是肉麻的捧场，诗人变得不是屡教不改的惯犯就是初登龙门的新贵，甚至在同一个诗人身上，还会发生朝戴桂冠暮负荆的奇怪现象^①。——这样的“批评”多年来对于我们可怜的诗人，试问有过什么教益啊。至于另一个“标准”，本来就和政治标准不可分割的“艺术标准”，则莫名其妙地形成一个危险的禁区，连最勇敢、最有权威的“批评家”都望而却步，变成和诗人一样可怜的儒汉。哪个“批评家”真正是个批评家，既不审判，也不吹捧——而是和诗人站在一个台阶上，作为他的诤友，同情他的甘苦悲欢，指点他的得失成败，预示合乎他作为诗人的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同时帮助读者真正成为诗人的知己呢？还是来说我们的艾青吧，几十年来有哪位批评家认真研究过这位杰出的诗人^②，研究过创作规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有

① 记得一位诗人偶然“望”了一下“星空”，就闯下了“把伟大的祖国同死寂的太空相比”，“发泄个人主义怨气”的大祸。

② 关于艾青的评论不能说一篇没有，三十年代有过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四十年代有过吕荧的《人的花朵》，五十年代又有过一些评价完全相反的“诗话”……。

机形态：研究他怎样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开始，通过同人民相结合，开创了一代的新诗风；研究他的作品怎样获得那么巨大的形象力，字字深入人心，没有一点废墨；研究他的成就决不单纯在于技巧，而在于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的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在于诗人把自己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高尚的情操；进而研究同一位诗人又如何饱经忧患，逐渐变得衰老，……再也写不出当年那样激动人心的诗篇来？

于是，批评家会咆哮起来：住口！你胡说什么？！别看批评在指手划脚，它永远只能跟在创作后面。没有伟大的创作，不会有伟大的批评，连这点文学史常识都不懂？看看你们新诗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论文化素养比不上古代和外国的前辈，论创作艰苦比不上同代的戏剧家、小说家，到今天仍然只会用新式的老调吟风弄月，伤春悲秋，或者难得到了国内外什么名胜地，忍不住写几句“到此一游”之类，和祖国人民目前的大痛苦、大愤怒、大欢喜、大希望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干？这难道不是事实，又是“帽子”、“棍子”吗？

可怜诗人只会歌唱，不善雄辩，他面对义正辞严的申斥，只好眼泪汪汪，哑口无言，手足无措了。

然而，更大更真的事实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灰姑娘”不知是什么缘故，被挂上了“小资产”的黑牌子，到

处受歧视，到处受排挤。到了“四人帮”当道，真正的诗更是在惨酷的政治炼狱中受尽诬蔑和虐待，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存权利。在那个有诗就有罪的时代，哪个读者敢读它，哪个老师敢教它，哪个编辑敢发表它，哪个批评家敢推荐它？倒真是“四人帮”倒台以后，诗才稍稍缓过气来，微微发出了一点声音。

然而，诗偏又是最娇嫩的，最经不起摔打的。“四人帮”摧残了百花，受伤最厉害的却要数诗，特别是抒情诗。小说、戏剧尽管同样蒙受打击，它们凭借客观叙述的手段，还能利用性格和情节争取和恢复读者的信任。唯独诗，它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诗人必须直接面对人生，面对现实，代表人民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如果不能放声歌唱，就只有哑然失声，这正是诗人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祖国又在经历一个脱胎换骨、方生未死的历史时期，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更艰苦的新长征。诗人必须歌唱，为人民歌唱，和人民一起歌唱……。是的，小草们歌唱起来了，嫩绿的诗芽破土而出了。但更多诗人的嗓子却怎么也高昂不起来，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使读者失望，使人民伤心。——不妨解放一下思想，敢问一个过去想也不敢想的问题：开国三十年来，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其中颇不乏才华照